



国防大学 2 071 3131 6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1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黄埔建军.....	章异之(1)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	李奇中(17)
中山舰事件前后	包惠僧(34)
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	章异之(46)
滇桂战争	黄绍竑(49)
刘镇华的一生	米哲沅(67)
徐树铮之死	吴锡祺(92)
一九三五年参谋团入川前后	吴晋航(96)
一九三六年成都事件	何北衡(106)
虹桥事件的经过	董昆吾(115)
关于再造派	周一志(118)
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	叶景莘(127)
辛亥福建光复记	刘 通(136)

附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附注

对《黄埔建军》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

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二十三辑、第三十辑

黄 埔 建 军^{*}

章 异 之

一、黄埔军校的建立

黄埔军校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经验来训练干部的新型军事学校。它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标志。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一年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广西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谈的时候，马林曾向他提出了关于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的建议。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通过党刊《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力量、企图从军事投机中取得胜利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只有仿效苏联，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才能获得成功。

由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的督促，同时也由于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并决定利用黄埔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作为军校校舍。因为军校设在黄埔，所以以后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

当时在广东的粤、滇、桂等系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挥，实际上他们各据防区，把持财政。他们对于军校的筹

* 本文由近代史研究所姜克夫同志提供部分资料并曾经在黄埔同学会负责的黄雍先生补充。

建,不仅不予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破坏。因此,关于创办军校所需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孙中山先生一筹莫展。例如军校开办时,孙中山先生批发了三百枝粤造毛瑟枪,但却只交涉到三十枝,勉强给卫兵守卫。黄埔建军计划确定之后,苏联为了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一面派了数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到军校担任教育工作,一面又无条件地拨给军校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苏联无代价地从海参崴分批运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调派了以周恩来为首的许多优秀党员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并参加军事工作。孙中山先生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军校的筹建工作才得以顺利实现。

孙中山先生除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外,关于校长的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当时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无论在党在军,都是后辈,孙中山先生派他为军校副校长,已经是“不次之迁”。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就离开广州,跑到上海,表示消极。这时张静江、戴季陶等出来替他撑腰,张还亲自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说情。孙中山先生这才改派蒋介石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还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度,并派廖仲恺为党代表。这个制度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的命令完全无效。有了这种制度,党的主义和政策的贯彻就得到了保证,就使军校真正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工具,而不致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后来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一起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军区别于过去一切旧军队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北伐军获得辉煌胜利的根本保证。

黄埔军校于校长和党代表之下,分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另设政治总教官和军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最初为戴季陶,后来戴离开广州,由副主任邵元

冲代理。邵元冲是一个封建思想很浓厚的官僚，他把政治部当作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干部，同党代表廖仲恺也很少打交道，同苏联顾问也不来往。他这样搞了一两个月，就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官僚机构。因此，学校师生都一致提出撤换邵元冲的要求。这个问题经过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伦将军的会商后，决定请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来作政治部主任。于是，中共中央就决定调周恩来担任了这个工作。

军校其他各主要部门负责人还有：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军事教官有刘峙、张元祐、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胡树森、沈应时、陆福廷等。政治部秘书为聂荣臻、鲁易。教育副官（当时亦称特别官佐）为季方、陈诚、徐坚。学生队总队长由邓演达兼任，副总队长严重；队长茅延楨、吕梦熊、金佛庄；区队长有蒋鼎文、严凤仪、倪弼、惠东升、邵子举、郭俊、曹石泉等二十四人。军事干部多半是从李济深的粤军第一师抽调的，学生队的班长大部分也是从李济深所办的西江讲武堂调过来的。

苏联顾问方面除鲍罗廷和加伦将军经常给以帮助外，派在军校工作的有：顾问长（总顾问）契列班诺夫（当时同学们称呼他为“柴顾问”）、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

军校把生工作除在广州能公开进行外，当时因全国各省都在军阀势力控制之下，只能秘密就地考试或者动员青年学生来广州投考。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各地组织在这一工作上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应考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区党委所遴选介绍的党团员以及革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广州直接招收的学生不多。第一期新生由于选择的标准比较严，只录取了四百七十名，后来又收录了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二十余名，因此第一期学生共约五百名。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有的仅具有中学

程度,还有连小学也没有上过的。但是从学生的政治条件来看,他们的家庭成份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据统计,第四期学生中,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占百分之二十八,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占百分之五十四,民族资产阶级占百分之十八。黄埔学生所以能够在统一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和北伐战争中表现出旺盛的战斗精神并且能够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的拥护和协助,除了军校政治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而外,他们本身的阶级成份也是一个根本因素。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亲临主持。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联式的黄卡基布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对于当时在场的各系军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的基础;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克扣军饷,剥削人民,贪图私利,贻害苍生,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成为人民的罪人。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二、黄埔军校的教育内容和各期概况

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的学程规定为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从第四期起,入伍教育期限延长为半年。教育内容是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重。一般学生的政治课程规定为: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

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等。至于政治班，则除了上列各项课程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际政治经济状况、苏联概况、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宣传鼓动工作的意义和作用、军队政治工作等等。每门政治课程最多的讲十六次，每次两小时；最少的讲四次。教员按照各门课程的授课次数编写讲授提纲，在规定时间内讲完。学生上课时当堂做笔记，既无书本，也没有讲义。

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讲演的人除孙中山先生外，国民党方面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等；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周恩来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的讲演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他们每次讲演时，大花厅（即大讲堂）里都挤得满满的，军校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国民党右派分子邵元冲的讲话最不受欢迎，人们把他叫作“催眠术教官”。

蒋介石为了使学生和官兵养成对他个人的崇拜，经常集合学生、官兵进行所谓“精神讲话”。他当时还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并住在要塞司令部里，作风和当时广东军阀一样，在要塞炮台前面竖着一面大红旗，旗上有个斗大的“蒋”字。要塞司令部和军校相距不到一里路，可是蒋介石每天上下班，总是警卫森严。他披着一件拿破仑式的斗篷，前面有一个副官开道，四个服装整齐的士兵背着步枪跟在他后面，威风凛凛，好似戏台上大将出征的神气。如果学生、官兵在路上遇见他，没有向他敬礼，他一定要追究，给予处分。

在军事教育方面，苏联顾问对黄埔军校所付出的劳绩是不可磨灭的。军校创办之初，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必须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训练出一批军事干部。但是按照传统军事教育制度，培养一个初级军官约需三年时间，而且军校的军官既是旧的军事学校出身，他们的军事教育知识都是旧的一套，要求他们

打破常规,以革命的办法来进行教育,也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下,这个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苏联顾问根据红军建军的经验,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和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安排了各项军事科目的进度和日程,并且定出详细实施办法。此外,苏联顾问还提供红军最新的资料,重行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在术科教育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级队长对于新的术科内容都是生手,都必须由苏联顾问讲解示范。因此,每教一个新科目之前,都先将各级队长集合起来,由苏联顾问亲自教练,把他们教会之后,再让他们回到各队去教学生。在野外演习时,苏联顾问常给学生作讲评。那时学校还没有沙盘设备,他们就用树枝和石头摆在地上代替沙盘,对学生详细说明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做是错误的,给同学们的印象很深。

第一期学生,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学习了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毕业,毕业时仍为四个队,共四百九十三人。后来又把原定编入第二期第六队的军政部讲武堂一部分学生一百四十六人提升到第一期,因此,第一期人数增加到六百三十九人。讲武堂学生有三百多人,当军校第一期毕业时,他们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并入黄埔,但全体官长反对,内部曾因此引起风波。当时由于急需下级军官,而讲武堂学生的学、术科成绩又较好,所以这一百四十六人并入黄埔军校后,特准提前毕业,并按照第一期毕业生的待遇分配工作。

第一期六百三十九人中,据李奇中同志估计,现已死去五百五十三人,只剩八十六人。

这一期毕业生除大部分派在本校教导团分别担任连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班长、文书、上士等职外,其余还有一部分派在校本部和政治部服务,一部分派在第二期学生队担任区队长,一部分派到其他部队和军事机构(如海军、医院等)任政治工作,一部分派在各农民、工人团体(如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广州工人纠察队

等)担任军事训练工作,一部分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少数派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当时同学们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不管什么工作都肯干,并不计较职位的高低,而且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

一九二四年八月,军校继续招考第二期学生四百五十人,开始分科(第一期不分科),编成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四个队,于一九二五年九月毕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招考第三期学生一千二百二十四名,编为一个入伍生总队,升学后编为十个步兵队(其中一部分是后招收的),一个骑兵团。从这一期起,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半年入伍期满,才转为军官学生。第三期学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毕业。

教导团成立后,军校由于调走了许多干部,乃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了一个下级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旧军官加以政治训练,作为补充。

一九二五年十月,招考第四期入伍生二千三百一十四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入伍生团,以后又成立了第三团(其中一部分后来编入第五期)。这时革命根据地已经统一,为了团结革命力量,统一军事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把原来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月一日,第四期入伍生升学,编为步兵科第一、第二两团和工兵科、炮兵科、经理科、政治科等四个大队。十月,第四期学生毕业。前三期学生毕业后,分发工作范围只限于第一军。从第四期起,由于学校改制,毕业生就分发到各军担任军职。因此,学校改制,对于在国民革命军全军范围内推广新的军事教育制度和军事组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三月,陆续招考第五期入伍生二千六百二十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各省青年投奔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日益增多。为了扩大入伍生的招考和训练,学校成立了入伍生部,同时筹备招考第六期入伍生。这期间又成立了高等教育班,

主要是训练各级参谋人才(只办了两期)。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潮州成立了分校,抽调当时驻在东江的各部队的行伍军官加以训练(共办了两期)。北伐军克服南昌后,临时成立了一个军官训练班,收容俘虏军官千余名施以训练。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后,黄埔军校的性质也就起了变化——它已由为革命服务的军事学校变成了为反革命服务的军事学校了。到了第七期毕业,黄埔军校就被蒋介石宣布停办了^①。据不完全统计,第六期共有学生四千八百九十九名(分为黄埔、南京两个部分);第七期共有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分在南京、黄埔、武汉三处毕业。黄埔军校前后七期共培养了一万五千四百余名军官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凡是优秀学生,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在各期学生中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起着核心和骨干作用。例如第一期学生中就有八十多个共产党员,第四期政治班四百六十人中就有九十九个共产党员。第一期学生中的陈赓、蒋先云,第四期学生中的林彪等共产党员,在学生中间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学生中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就是由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王一飞、周逸群等负责领导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例如学生自己组织的血花剧社,曾经自编剧本,上演了一些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话剧,得到群众的好评。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军校各期学生的籍贯以湖南、广东两省为最多。前四期学生中,湘籍学生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二,粤籍学生占百分之十七点一;如以七期学生平均统计,则以粤籍学生居首位,为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湘籍学生次之,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二;再次为浙江百

^① 据东方杂志第27卷第20号时事日志载,黄埔军校于1930年9月17日“奉总司令令停办,由第八路司令部派员接收”。

分之七点二和江西百分之六点二四等省。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军校学生中有一部分外国籍学生,如第四期有朝鲜籍学生二十四名,七期共有三十四名,还有一部分越南籍学生,七期共有十三名;并有少数蒙古、新加坡等外籍学生。这一事实表明,黄埔军校在为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培养革命干部方面,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黄埔军校除了培养出七期军官人才之外,一九二四年底成立教导团,也是一件大事。当时教导团的新兵大部分是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来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工人中有不少丝织业工人,共编成两个团。教导团的各级干部都由第一期的教职员和毕业生担任: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王柏龄任第二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沈应时、蒋鼎文、刘尧宸分任营长;陈诚、郭俊、惠东升、邵子举、宋元竞等分任副营长和连长。第一期毕业生除少数担任连长外,其余分别担任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第一团党代表为缪斌,第二团党代表为王登瀛,营级、连级党代表由第一期毕业生分别担任。

教导团的编制采用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战斗兵。团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机关枪连、一个特务连以及侦察队、通讯队、卫生队、辎重队各一队。作战时一般都是以连为作战单位,由军官持驳壳枪任前驱,士兵持步枪跟着军官前进。每连有军官九人,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战场上不仅身先士卒,还要监督其他官兵作战。这一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的主要力量,能够以少胜多,每攻必克,充分表现了革命军队的英勇顽强的特色。

教导团发展得很快,成立后几个月之内便扩大成为两个师(师长何应钦、王懋功);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就编成了一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三、黄埔军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国民党改组后，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因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势力也就加紧勾结起来，阴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广州的商团原是英国帝国主义直接支持下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武装，以香港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其首领。他们与英国香港政府和军阀陈炯明勾结，利用商团名义，向香港德商订购大批军械，由一丹麦轮船运来广州，阴谋暴动。孙中山先生接得密报后，立刻派黄埔学生乘军舰前往沙角拦截，把这批军械押回黄埔军校。广州商团两次罢市要挟发还，并开枪射击十月十日国庆节的游行群众。同时，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也向广东的革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公然以武力干涉相威胁。于是，广州的局势突然严重起来。孙中山先生对商团的态度，开始还不够坚定，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才决心采取坚决的镇压政策。十月十日派出黄埔军校学生，开始军事行动，其他各军也随同动作，把商团包围在西关一带，经过一天的激战，就全部肃清。在平定商团的斗争中，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其自卫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商团叛乱的削平，严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从而使广东的革命政府得到初步稳定。

黄埔学生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第一次锻炼，提高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黄埔学生战斗精神的旺盛、军纪的严肃，给广州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本来是很不巩固的。那时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有军阀陈炯明盘踞着。他们在英帝国主义和北京反动政府援助下，准备打回广州，消灭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之下，广东革命军队举行了第一次东征。这次东征的主力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由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学生军的英勇作战,和共产党员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的支援,到三月底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占领了潮汕。在这次战役中,以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棉湖之战最为激烈。革命军以千余人抗拒号称万人的敌军,苦战半日,终于在友军的配合下,把敌人打垮。苏联顾问对全体官兵讲话时,对这次战斗给以极高的评价。在这次战役中,共产党员负伤的有连长郭俊、刘畴西等多人。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与英帝国主义及云南军阀唐继尧勾结,图谋颠覆广州的革命政府。为了削平叛乱,东征军兼程回师广州,留守黄埔军校的第三期入伍生也同时出动。六月十二日开始总攻击,在广州的工人及近郊的农民帮助之下(如铁路工人罢工,使敌军不能及时调动军队),仅半天的时间,便将杨、刘叛乱削平,革命政府乃转危为安。

第一次东征胜利及平定杨、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之下,将广东根据地原有的大元帅府的革命政权改组为国民政府。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时候,黄埔军校的教导团已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将许崇智的粤军改编成为一个师,合并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阴谋暗杀,全校师生悲愤万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学生和部队,与友军配合并依靠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散和重新改编了广东军阀许崇智指挥下的粤军,并把胡汉民和许崇智驱逐出境。

一九二五年十月,广东革命军又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的党代表。十月九日,部队逼近敌人重要据点惠州城。十月十三日开始攻城,战斗非常激烈,第四团团长刘尧宸及副营长共产党员谭鹿鸣等都是在攻城时阵亡的。十月十四日傍晚,终于将号称东江

天险的惠州城攻下。从此,长驱直入,二十一日占河源,二十二日占紫金、五华,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大破敌军万余于河婆。至此,陈炯明军队的主力消灭殆尽。最后追歼残敌于福建边境的永定,完全收复东江全境。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员唐同德等多人牺牲。

和第一次东征一样,农民的支持对第二次东征的迅速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各地农民协会号召之下,男女老幼踊跃给东征军抬机关枪、挑弹药,还热情地把糖稀饭送到阵地上。行军时有些农民兄弟还端着喂马的饲料边走边喂。农民对革命军队的热情使同学们感动得流下泪来。

在历次战役中,黄埔学生都组织了宣传队,在战场附近的农村和城市进行宣传。共产党员傅维钰、李劳工等,当时都是负责领导宣传工作的。李劳工就是在敌后宣传中被反动派杀害的。

当时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如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多半是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沙基惨案,黄埔学生死难的有文起代等多人。

四、两条道路的斗争

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威望的增高,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这就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敌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的尖锐化,黄埔军校的反动分子也就日益露出了反革命的苗头。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共产党为了改造在革命政府之下的各军军人的意识形态,发动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陈启科、黄鳌、李汉藩、杨其纲、袁策夷、刘云、

张际春、余洒度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郭俊、唐同德、茅延桢、鲁易、胡公冕等。这个组织的活动范围很广，不只限于黄埔军校，也不限于陆军；当时滇、桂、湘各军所设的军官学校，都直接或间接接受了它的影响。这个组织在平定杨、刘叛乱战役中，对于瓦解杨、刘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这个组织却成了军校中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眼中钉。在第一次东征时，贺衷寒、缪斌等人就在戴季陶的影响下并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组成了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这个反动组织的主要人物除了贺、缪二人以外，还有杨引之、冷欣、杜从戎、潘佑强、伍翔、曾扩情^①、鄧悌、贾伯涛、胡靖安、余程万、李杲、胡宗南、桂永清、蒋伏生等。教职员中王柏龄、林振雄、徐桴、王文翰、童锡坤、张叔同等，以及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海军将领陈策、欧阳格，公安局长吴铁城等也都加入。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由萧叔宇、段锡朋和西山会议派童理璋、喻育之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广州互相呼应。国民党在改组初期分化为三派，到了孙文主义学会成立的时候，大体上又合流了，他们相互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是在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共活动方面差不多是一致的，仅仅在程度上略有差别而已。

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成立之初，为了照顾国共合作的精神，规定凡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当然会员。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参加这个组织的分子就有意识地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样，就很自然地把青年军人联合会纯洁化了，它就成为纯由共产党人组织领导的团体，不过名义上还是受军校校长和党代表的领导。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后，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时常发生摩擦，

^① 曾扩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脱离青年军人联合会，但没有参加孙文主义学会。

革命年代

明争暗斗，非常激烈。这个反动组织平时专门监视学生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甚至在深夜里偷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有一次林振雄同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此事当时引起了大风潮，事后虽由廖党代表将林振雄撤职查办、李汉藩记大过一次而告结束，但双方的斗争还在继续发展。学校的风潮虽然暂时平静下来，可是东征军从广州出发，一直进到潮梅，孙文主义学会就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一直摩擦到潮梅。由于周恩来领导有方，一路上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潮梅底定之后，贺衷寒同李之龙有一次在梅县集会上发生冲突，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结果把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贺衷寒也受到撤职处分。第二次东征时，双方又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打了一次大架，形成势如水火、不可调和的局势。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蒋介石才下令同时取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双方自行解散通见《政治周报》第十期），另组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军校的学生和教职员的组织统一起来，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虽然从此解散了，但孙文主义学会不仅仍然用黄埔同学会的形式借尸还魂地存在着，而且这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一直到大革命时代还散布在全国各省市，干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成为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深深懂得掌握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有了一切。因此，蒋介石在东征以后，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企图把黄埔军校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排挤出去，以此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先决条件。于是，蒋介石经过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和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倪弼、陈肇英等共同策划了反共反苏的大阴谋——中山舰事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其爪牙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要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黄埔后，他们就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三月

二十日，蒋介石就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并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同时拘捕了黄埔军校中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绝大部分的共产党员，随后就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从而窃取了第一军的军权。

中山舰事件以后，蒋介石接着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六月，蒋介石就以这个“整理党务案”作为武器，要黄埔军校的干部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这一反动措施更加引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有些学生本来并非共产党员，却在填表时自动填上了共产党的党籍，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自此以后，黄埔军校学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蒋介石千方百计地企图收买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但是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都能坚定地站稳立场，没有堕入圈套。例如蒋先云就是蒋介石竭力企图收买而始终收买不到的优秀党员之一。蒋先云是黄埔学生的主要骨干，能力既强，威望也很高。他从军校毕业后就被蒋介石调去当他的随从秘书和总司令部警卫营营长。蒋介石曾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利诱，企图迫使他脱离共产党，但是他始终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蒋介石。他后来干北伐时在叶挺部队中任团长，在河南打张作霖时于东西洪桥的一次战役中壮烈牺牲。蒋介石还利用同乡关系来拉拢金佛庄，不止一次地暗示他脱离共产党。但金佛庄也未为所动。一九二六年克复南昌后，蒋介石调金佛庄赴浙江做敌后工作，他经过南京时被孙传芳捕杀。蒋介石当时虽然同孙传芳打仗，但还有信使往还，有人认为金佛庄之遇害，是蒋介石运用曹操杀弥衡的手法把他杀死的。照当时情况看来，这是很有可能的。又如共产党员胡秉铎也因何应钦收买未遂，后来竟被杀害了。当然，也有少数共产党员因立场不稳而被收买过去的。当时政治主任教官萧楚女曾以“个人主义的三十六变”为题，在黄埔军校作了几次长篇讲演，就是从侧面